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Arts & Humanity)
第70卷 第6期 2017年11月
Vol. 70. No. 6 Nov. 2017. 016～026
DOI:10.14086/j.cnki.wujhs.2017.06.002

乾隆朝诗学史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蒋 寅

摘 要：乾隆一朝是清代文化、学术最繁荣的时期，也是诗学最发达的时期，诗论家众多，诗派林立。社会富庶，君主右文，科举恢复试诗，幕府争揽贤才，形成普遍的诗歌风气。而浓厚的学术风气在给予诗歌强烈刺激的同时，也挤压着诗歌生活的空间，带来性情与学问的紧张。原有的格调诗学走向总结和综合，试帖诗学推动蒙学诗法的复兴，新起的性灵诗学和肌理诗学从不同方向为弥补神韵诗学的缺陷而各辟新途，桐城文派、高密诗派从不同的文学传统中发展出各自的诗学观，强化了乾隆诗学整体上的多样化格局和丰富的诗学理论，使乾隆诗学史的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本文在总结、反思前期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以时间线索为经、以流派为纬的研究思路，力求以一个清晰、合理的格局展开对乾隆朝诗学史的论述。

关键词：乾隆朝；诗学史；清代；幕府
中图分类号：I207.22；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17)06-0016-11

乾隆朝诗学能否作为清代诗学史的一个独立时段来看待，一定是存在疑问的。质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王朝为诗学史分期的单位是否合理，二是乾隆一朝的诗学是否具有某种自足性，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段落？从我进入清代诗学史的研究开始，就一直心存这一诘问。近几十年来，放弃以王朝为历史分期单位的主张，在文史学界一直呼声很高，用年代、世纪、文化特征乃至国体作为历史分期单位来讨论中国历史、文学的方式也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用①。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以王朝为分期单位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因为王朝不只是一个纪年的时间框架，更是联系着文化、政治认同的生活空间和想象的共同体。被称为盛清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来史家都认为圣祖主张宽和，近乎德治；世宗主张严厉，近乎法制；高宗主张宽严并济，近乎文治②。三朝的治国理念决定了其政治、文化、经济政策和行政模式，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带来特定的生活感受和心理趋向。世宗鉴于康熙末年皇子们为争夺皇位骨肉相残的教训，为了杜绝其弊，采用储位密建之法。当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日世宗驾崩，庄亲王允禄等开启传位诏书封匣，宣告弘历膺祚继统时，臣民起码可以放心，这位才识兼备、深受圣祖宠爱并合法即位的新皇帝，不会带来皇权之争遗留的政治恐怖和人事变更，朝野可以期待一个平安祥和时代的来临。这就是王朝纪年“乾隆”作为历史分期单位所具有的文化标志意义——一个大权独揽的君主确实能决定一个历史时期的面貌，它足以构成一个具有自足性的时间阶段及其过程，让我们建立起诗学史叙述。当然，我也意识到历史的面貌只能根据文献记载和有限的实物遗存来复现。从根本上说，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即所谓史实只

①有关清史研究中的这一倾向，可参看司徒琳.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赵世瑜，赵世玲译//清史译丛：第4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2-83.
②庄吉发.运际郅隆：乾隆皇帝及其时代//清史论集：十三辑.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110.

不过是一串无法精确定义的概念和完整时间过程的部分片段，其真实的含义本来只有在完整的历史中才能体现，而历史却永远无法完整地再现，这就决定了一切历史叙述都是介于可信的判断和难以证实的推断两者之间的假说，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个主观设定的框架内进行操作，就像我将乾隆王朝的诗学作为清代诗学史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来认识。首先强调这一点，不是要为自己有限的历史知识寻求免责，而只是想表明，我希望做一个严肃的诗学史研究者，而不假装做一个历史学家而又不受历史学科学术规则的约束。

一、文人入幕与地方文学风气

君主右文足以影响一代风气，非仅朝中满汉大臣都雅好文艺，热心著述，地方长官、封疆大吏也无不崇尚文学，延揽才学之士入幕，形成清代独特的幕府文化。我们知道，唐代幕府的僚佐出于府主自聘，申报朝廷授以职衔；宋代幕府僚属皆命于朝，“宾主邈不通情，殆与郡县官等。阃寄兵谋，无从咨访；川泳云飞，岂复有相得之乐？”①清代的幕僚也是自聘，但朝廷无职官除授，与府主谊属主宾，因而史学界也称“幕友”，从理论上说更受府主礼遇。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朝廷取消童试名额限制，天下诸生数量急剧增加，而乡、会试中式名额不加多，致使社会上增添许多游士，为幕府招纳博学能文之士提供了条件，而大量冗余文士也藉此得到一个谋生的出路。周星誉《王君星诚传》已注意到：

> 国家当康熙、乾隆之间，时和政美，天子右文，王公大臣相习成风，延揽儒素。当代文学之士，以诗文结主知、致身通显者，踵趾相错。下至卿相、节镇，开阁置馆，厚其廪饩，以海内之望，田野韦布，一艺足称，无不坐致赢足。②

乾隆间因烽息兵弭之久，督抚藩臬均以文臣居之，多招纳文士为幕友，不付以刑名钱谷之务，而专事公文案牍，兼任西席，课授子弟，暇则相与商略学术，赏玩金石书画，诗酒唱和之余，采掇文史，编纂书籍。这样的风雅在前代幕府中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唐时代颜真卿的幕府就以雅集联唱和编纂《韵海镜源》著闻，但那只是偶尔一见的个案，像乾隆间南北各地文士如云的幕府，实乃是前所未见的奇特景观。因而近人全增佑说：“于时督抚学政，颇广开幕府，礼致文人，而不尽责以公事。此等入幕之宾，初不同于刑钱幕友，此种幕府不啻为一学府，其府主往往为学术界名流前辈，故人才之造就于此为盛。”③当时以聚集文人学士著名的幕府，严迪昌已提到卢见曾、朱筠、朱珪、王昶、翁方纲、曾燠、毕沅、阮元等④，我还可以补充钱陈群、方观承、孙星衍、朱一蜚⑤、雷鋐、谢启昆等。这些人物的公暑，如翁方纲的小石帆亭，王昶的兰泉书屋、蒲褐山房，朱筠的椒花吟舫，曾燠的邗上题襟馆，阮元的定香亭、研经室、琅環仙馆，都是著闻一时的文艺沙龙，雅集唱和，传诵于时。最为人乐道的，如卢见曾任两淮盐运使时，“凡名公巨卿、骚人词客至于其地者，公必与选佳日，命轻舟，奏丝竹，游于平山堂下，坐客既醉，擘笺分韵，啸傲风月”⑥。又承渔洋遗风，发起红桥唱和，盛传一时。嘉庆初曾燠继任该职，名士归附，再修风雅盛事，编有《邗上题襟集》。毕沅幕府也是诗酒之会，常年不绝，编有《乐游联唱集》。

当时著名的幕府，宾客少则数十人，多至上百人，人才济济，可谓古来罕俦。阮元巡抚浙江、总督两广，在杭州、广州创立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更是青年才俊的渊薮。据尚小明通过《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清代学者生卒及著述表》、《清史列传》(儒林、文苑)三书统计，从康熙中到嘉庆末，学人有游幕经历者占总数的35％到40％⑦。这个数据足以显示乾隆前后士人游幕风气之盛，其中许多寒畯之士藉由府主的赏拔而成名。如阮亨《瀛舟笔谈》记载：“两浙诗士为余兄最所赏拔者，每引居幕府，为亨等之师友，前后

---

①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178.
②周星誉.王君星诚传//续碑传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八十一.
③全增佑.清代幕僚制度论.思想与时代.1944，(31)～(32).
④严迪昌.清诗史：下.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641-647.
⑤蒋士铨.朴庭先生传//邵海清，李梦生.忠雅堂集校笺：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096-2097.
⑥沈起元.运使卢雅雨七十寿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5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76.
⑦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1.

凡十人:青田端木先生国瑚、鄞县童先生槐、钱塘陈孝廉文述、钱塘陈明经鸿寿、嘉兴吴明经文溥、会稽顾明经延纶、平湖朱先生为弼、乌程张明经鉴、归安邵孝廉保初、石门方茂才廷瑚。余兄尝欲撰十子诗,名曰《官斋十子集》,未果成也。"①幕府这种大规模的文士雅集和诗咏活动,使乾隆诗坛格局较清初发生了一些变化。

嘉道间人已注意到乾隆间幕府文学活动的影响,钱泳《履园丛话》写道:

> 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如王文简之与朱检讨,国初之提倡也;沈文悫之与袁太史,乾隆中叶之提倡也;曾中丞之与阮宫保,又近时之提倡也。然亦如园花之开,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两淮运使,刻《邗上题襟集》,东南之士,群然向风,唯恐不及;迨总理盐政时,又是一番境界矣。宫保为浙江学政,刻《两浙輶轩录》,东南之士,亦群然向风,唯恐不及;迨总制粤东时,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琼花吐艳,惟烂漫于芳春;璧月含晖,只团栾于三五,其义一也。②

这里本意是强调公卿主持风雅就像月圆花开自有其时,时节一过星移物换,即有另一番景象。如阮元出任浙江提学使时,留意风雅,嘱幕下文士采摭浙江人士诗咏,编纂《两浙輶轩录》,写作《定香亭笔谈》;而到后来任两广总督时,则创设学海堂,编刻《皇清经解》,心思专注于经学和教育了。但钱泳毕竟注意到阮元、曾燠这些封疆大吏对地方风雅的提倡之力,还是很有意义的。他还详记了曾燠在扬州盐运使任上与文人往来唱和的风雅:

> 南城曾宾谷中丞以名翰林出为两淮转运使者十三年。扬州当东南之冲,其时川蜀未平,羽书狎至,冠盖交驰,日不暇给,而中丞则旦接宾客,昼理简牍,夜诵文史,自若也。署中闢题襟馆,与一时贤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简斋、王梦楼、王兰泉、吴谷人、张警堂、陈东浦、谢芗泉、王葑町、钱裴山、周载轩、陈桂堂、李啬生、杨西禾、吴山尊、伊耐园,及公子述之、蒲快亭、黄贡生、王惕甫、宋芝山、吴兰雪、胡香海、胡黄海、吴退庵、吴白庵、詹石琴、储玉琴、陈理堂、郭厚庵、蒋伯生、蒋藕船、何岂匏、钱玉鱼、乐莲裳、刘霞裳诸君时相往来,较之西昆酬唱,殆有过之。③

阮元所招揽的端木国瑚、童槐、陈文述、陈鸿寿、吴文溥、朱为弼、张鉴等,还只限于浙籍士人;曾燠处于南北要冲扬州,接引、延聘的更都是一时名公,即以钱泳开列的名单而言也足够分量。对这些士人而言,像曾燠幕府这样著名的沙龙,正是他们交结名流、激扬声誉、博取进身机会的一个有辐射力的名利场。

有关清代幕府、士子游幕与乾、嘉文坛的关系,从郑天挺《清代的幕府》、《清代幕府制度的变迁》二文到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已有很好的论述,近年学界对乾嘉间士人游幕带来的幕府唱和之盛、幕僚由文学向考据的兴趣转向、游幕士人的心态等问题也有了更深入的分析④,让我们觉得对文人游幕这一由来已久的现象有必要重新加以认识。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幕府广揽人才并不单纯是为了标榜风雅,其中还潜藏着实际的文坛势力的培植与竞争。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论王昶云:

> 藩从先生游,垂三十年,论学谈艺,多蒙鉴许。后先生因袁大令枚以诗鸣江浙间,从游者若鹜若蚁,乃痛诋简斋,隐然树敌,比之轻清魔。提唱风雅,以三唐为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负贩之人,能用韵不失粘者,皆在门下。嘉庆四年,藩从京师南还,至武林,谒先生于万松书院,从容言曰:"明时湛甘泉,富商大贾多从之讲学,识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诗争立门户,而门下士皆不通经史,粗知文义者一经盼饰,自命通儒,何补于人心学术哉?且昔年先生谓笥河师太丘道广,藩谓今日殆有甚焉。"默然不答。是时,依草附木之辈闻予言,大怒,造谤语构怨,几削著录之籍,然而藩终不忍背师立异也。⑤

王昶既曾佐云贵总督幕多年,也曾任两淮盐运,江西、陕西按察,云南、江西布政使,他编纂的《金石萃编》

---

①阮亨.瀛舟笔谈.嘉庆二十五年刊本:卷十.
②钱泳.履园丛话: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206-207.
③钱泳.履园丛话: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215-216.
④侯冬.曾燠幕府雅集与乾嘉之际文人心态.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梁结玲.士子游幕与乾嘉文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
⑤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60.

《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文传》《湖海诗传》等书，都是卷帙繁多的大型总集，没有幕僚们的襄助，是很难以个人之力编成的。江藩所载王昶招揽生徒、树帜门墙之事，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幕府以各种方式延揽贤士，争夺人才，却是不争的事实。府主的文化工程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幕宾的协力，像毕沅《史籍考》《续资治通鉴》《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都是幕下章学诚、邵晋涵、孙星衍、张埙、严长明、钱坫等文士襄助完成；谢启昆所纂《西魏书》《小学考》《广西通志》，续纂《史籍考》，也主要借助于陈鳣、钱大昭、胡虔之力。曾燠因笃嗜骈体文，还嘱幕僚编纂了一部《国朝骈体正宗》。阮元所主持编纂的《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畴人传》诸大书，更都是依靠他那多至120人的幕僚团队①。“皆自起凡例，择友人、弟子分任之”②。在幕府纂修的书籍中，最具标志意义的乃是各省通志，此举不仅促进了各地的方志编纂，也直接激发了地方诗歌总集编刊和地域诗学的勃兴。

作为太平盛世的当然景观，地方的文酒诗会也不亚于幕府文学的盛况。京师作为首善之区，历来文会最盛。乾隆十七年(1752)值皇太后六十大寿，以二月举乡试，王昶偕褚寅亮正月之金陵，宝山朱桓大会名士240余人于秦淮，为江南友声二集③，重现明末十郡大社的盛况。而台阁官僚的生活，一直都持续着风雅化的趋向。乾隆间的实证学风更刺激了考订金石、书画的风气，日常雅集题咏常以鉴定、赏玩金石书画为题材。乾隆四十四年(1779)冬，翁方纲嘱罗聘写《东坡戴毡笠折梅花像》供奉于苏斋，十一月十九日因罗聘次日出都，遂约程晋芳、张埙、吴锡麒、桂馥、黄景仁、洪亮吉等人聚于苏斋，为东坡预祝生日，兼为罗聘饯行，从此遂为故事，每年十二月十九日于苏斋聚会为东坡祝生日。法式善仿效之，则于六月九日为李东阳祝生日，都成为传诵一时的韵事。王昶《官阁消寒集序》载：“乾隆丁酉冬，予为通政司副使，职事清简，暇辄与钱阁学籀石，朱竹君、翁覃溪、陆耳山三学士，曹中允习庵，程编修鱼门，举消寒文酒之会。会自七八人至二十余人，诗自古今体至联句、诗余，岁率二三举，都下指为盛事。”④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冬，“是时翁振三宫詹、曹来殷学士、陆健男大理皆奉使督学，都门无复有诗酒之会矣”⑤。

这是京师的情形，地方上的游宴诗咏很少会因某些人物的仕途升迁而消歇冷落。事实上到明清两代，乡绅阶层很大程度上已充当了地方文化事业的主持者或赞助者。而文化沙龙由达官贵人的府邸下移到各地富商的宅第，似乎也是乾隆年间出现的一个醒目现象。康熙间最有影响的沙龙都在京师，到乾隆时代各地出现许多文士的沙龙，最著名的如扬州马氏兄弟小琳珑山馆，天津查为仁水西庄，杭州赵公千小山堂和吴焯瓶花斋，苏州王庭魁小停云馆，等等。当时富商本身就是文人或富商而附庸风雅的人很多，诚如袁枚所说，“升平日久，海内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瑛、徐良夫之风，蓄积书史，广开坛坫”⑥。其中，最号富庶繁华的扬州，风气也最盛，据李兆洛说：

> 邗上当雍正、乾隆间，业鹺策者大抵操奇赢，拥厚赀，矜饰风雅以市重。一时操竽挟瑟名一艺者，寄食门下，无不乘车揭剑，各得其意以去。至嘉庆时而鹺贾亟亟自顾不暇，无复能留意翰墨。⑦

扬州最著名的小琳珑山馆主人马曰琯、曰璐兄弟，富甲一方，雅号文艺，收得徐乾学传是楼、朱彝尊曝书亭两家藏书⑧，礼致四方文人，长年寄居其第，从事经史考订、诗文著述。而此刻，文士阶层也因社会地位的沦落而不得不陷入各种依附关系中。

清初士大夫阶层因对新朝抱有敌意，以“三大布衣”为代表的众多高才博学之士都隐居不出，从而使在野士人因道德上的优越感而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到清代中叶，士大夫阶层已形成对新王朝的政治认同，文人的政治出路要么是由科举进身成为官僚，要么出入幕府成为达官的幕宾，逐渐丧失在野的优势。即使像蒋士铨这样官居清要的著名文士，仍不得不依附于尹继善、裘曰修，至于像袁枚这样依附权贵重

---

①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28.
②阮亨.瀛舟笔谈.嘉庆二十五年刊本：卷七.
③严荣.述庵先生年谱：上.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10.
④王昶.春融堂集.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刊本：卷四十.
⑤严荣.述庵先生年谱：下.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66.
⑥袁枚.随园诗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69.
⑦李兆洛.跋储玉琴遗诗后//养一斋文集.道光二十三年刊本：卷七.
⑧方盛良.清代士商互动之文化原生态个案考论——厉鹗与“小玲珑山馆”.文学评论，2007，(4).

臣以文治生更是一个典型的现象。再等而下之,就只能像厉鹗、全祖望那样做富商的清客,利用其丰富的藏书来撰述自己的著作了。厉鹗的《宋诗纪事》一百卷正是居停马氏小玲珑山馆多年,利用马氏丰富的藏书编纂成书的。也只有凭藉马氏收藏之富,他才能编纂出这样的著作。后来赵之谦曾深有感慨地说:"乾嘉间学人有啜饭处,道光以后,无乞食处矣。"①无论在西洋还是东方艺术史上,寄食制都是对艺术发展有促进作用,保证艺术走向精致和成熟境地的重要机制,乾隆间文士寄居于富商家的情形很类似于寄食制,它不仅是当时诗学研究的一种方式,在很多情况下也直接催生了诗歌批评的写作。因为文酒诗会历来是诗歌批评的温床,我们看到一些诗话的写作直接与此有关。比如查为仁《莲坡诗话》,沈楸德跋云:

> 夫人幸生隆盛之朝,得与当代名流,联吟结社;因而摘其篇章,详其姓氏,汇为一编,俾后之览者,如亲见吾謦欬于先生长者之前,而吾之篇章姓氏,亦藉此以传,岂非人生一大快事哉!②

当时有些诗话主要内容就是这类社集风雅的记录。薛雪《一瓢诗话》自序即言"将数月以来与诸同学与诸弟子,或述前人,或摅己意,拟议诗古文辞之语,或庄或谐,录其尤者为一集"。诗歌批评异常活跃的现实及写作风气,造成了乾隆时期诗话编撰、出版的旺盛势头,一大批以记载诗坛佚事为主旨、顺便讲论诗歌技艺的诗话络绎问世,其代表之作就是查为仁《莲坡诗话》、袁枚《随园诗话》、李调元《雨村诗话》、法式善《梧门诗话》等以性灵派诗话为主的作品,其内容以评骘当代诗歌为主,与沈德潜、纪昀、洪亮吉等人代表的学理性的诗歌批评和翁方纲、赵翼所代表的学术性的诗歌研究相对立,形成一股新的潮流,它也开了嘉道以后诗话写作多纪事少品评、以记录性代替艺术性的风气,并愈益占据诗话写作的主流地位。嘉道以后诗话之多而滥,很大程度上与乾隆时期诗话写作的散漫、轻率作风有关。章学诚对袁枚诗话的深恶痛绝,也很可能溯源于此。

二、乾隆朝的诗歌风气与诗学品格

在我的清代诗学史分期中,其他三个时期都包含两个以上的世代,只有乾隆独自构成一个时期。为什么乾隆能够独自构成一个诗学史时期,在《清代诗学史》第一卷的导论中并未细论,现在需要作些补充说明。

韦勒克在为《观念史大辞典》撰写的"文学史的分期"条目中,对"文学时期"是这样定义的:"文学时期是由一组文学规范所决定的一个时间段落——这些规范包括成规、文类、作诗的理念、大家的标准等;其产生、流传、转变、整合、衰落、消失的过程都可以追溯得失。"③我觉得这是个很周到的定义,以此衡量乾隆时代,我们有理由将性灵诗学作为决定诗学史时期的规范,尽管乾隆是个多种诗学观念对立、冲突、并存的时代,但性灵诗学成为贯穿始终的主流,它的产生、流传、转变、整合、衰落、消失的过程都清晰可见。

怀特海曾指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征,它由该时代的人们对于他们所遇到的重要事件的反应来决定。这种反应取决于人们的基本信念——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恐惧和他们的价值判断。"④乾隆时代,诗坛遭遇的最重要的事件是考据学对诗学的冲击,从而构成乾隆诗学的主题——学问与性情。虽然程度不一,但当时很少有人能自外于这两者间的关系,当时重要的诗论家不约而同地涉及学人之诗、才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论辩,正与这无人不笼罩在其中的文化背景有关。生活在这一特定环境中的文士,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自身定位——是做经学家、博学家还是纯粹的文人,纵然他不在意这些身份的区别,作诗时选择哪个家数——学人之诗、才人之诗还是诗人之诗,也一定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从日常生活到写作,都无法回避当时社会流行的一股浓厚的学问和考据风气。徐世昌论及乾隆间诗坛风气,曾说:

---

①张舜徽.学林脞录 爱晚庐随笔.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218.
②查为仁.莲坡诗话//丁福保.清诗话: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19.
③李亦园.观念史大辞典:第 3 卷.重庆: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203.
④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观念的历险.洪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82.

考据之学，后备于前。金石之出，今富于古。海云鼎籀，纪事西樵。杜陵铜盘，征歌石笥。钟彝奇字，敷以长言。碑碣荒文，发为韵语。肴核坟典，粉泽苍凡。并足证经，亦资补史。苏斋备体，雷塘嗣音。滂熹洽闻，瓶庐精鉴。诗道之尊，又其一也。①

观摩书画，赏玩古董，以致品鉴考订，历来就是文人的雅好清玩。杜甫虽享受升平日月无多，但境况稍得安闲，即多题咏绘画之诗。赵宋以降，题咏书画更成为诗家热衷的题材之一。但诗中频繁地以书画、骨董为主题，却断是乾隆诗坛独有的风气。正像吴荣光《和潘芝轩先生销寒六首·雪里遗书》一首注："时观黄大痴快雪时晴图、赵吴兴临快雪帖合卷。"②当观赏古董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诗歌的题材就离不开它了。

京师历来是观王朝文学风气的晴雨表。乾隆间京城诗人以赏玩骨董为题材做诗，似乎是钱载开的风气。钱载年轻时诗中多有题咏书画古董之作，但还属于记一时眼福，到乾隆十年(1745)所作《观聂大年小瀛洲赋墨迹用苏文忠公病中夜读朱博士诗韵》《六十七研铭拓本歌》，就开始以小序、自注来记载或考究其内容了。乾隆十三年(1749)馆于吏部侍郎蒋溥邸，助其编纂《三希堂法帖》，得以广交京师文人墨客，多见古贤名迹，诗中题咏之作也日益多起来。乾隆二十八年(1763)一岁即有《题刘忠肃公石鼓山题名后》《教习庶常馆敔器图歌和翁中允》《郑遂昌小瀛洲记墨迹》等 20 余首题咏古玩之作保留在诗集中。其他作家如赵翼自乾隆二十年(1755)入朝任中书，蒋士铨自乾隆四十三年(1779)六月入京，都同样为这股风气所包围，诗作集中于题咏字画、古物。就连黄仲则这样纯粹的文士，也不免受到感染，一入京便陆续写作了《翁覃溪先生以先文节公像属题李晞古笔藏夏邑彭春农侍讲家此先生属山阴朱兰圃临本也》《王兰泉先生斋头消寒夜集观邝湛若天风吹夜泉砚作歌》《丙申冬于王述庵通政斋见邝湛若八分铭天风吹夜泉砚为作歌今翁覃溪先生复出邝书洗研池三字搨本与研铭合装属题池在广州光孝寺邝读书处也先生视学广东曾访之》《汉吉羊洗歌在程玉门编修斋头作》《王述庵先生招集蒲褐山房观刘贯道兰亭禊饮图作歌》《集吴香亭太常斋见所藏孙雪居董香光书画合册作歌》《蒋心余先生斋头观范巨卿碑额搨本》这些文物考证式的七古。《汉吉羊洗》一诗题下注："同作者蒋新畬、翁覃溪两先生，吴谷人、陈伯恭两编修。"③可见一时风气一时人物莫不如此。考据的癖好也影响到咏物诗，前代咏物以征典与状物为主，乾隆间的咏物明显打上了考据的烙印。赵翼《金鱼》诗写道："汉唐以来无金鱼，有之实始北宋初。六和塔下逐臣咏，子瞻继往投斋余(咏之自苏子美始，见《冷斋夜话》)。此地何年移种至，大者尺余小寸计。"④至于《友人以邺城怀古诗见示但侈陈魏瓦齐砖而于历代割据建都之迹殊多挂漏为补成八首》⑤，就明显是以诗做考据文章了。

徐世昌论清诗，曾用诗教之盛、诗道之尊、诗事之详和诗境之新来概括清初、清中叶及清后期诗歌创作的特点。与乾隆诗坛相对应的是诗道之尊，这个"尊"字我理解即词学中"尊体"之尊，意谓诗歌在乾隆时代获得空前的崇高地位。这从袁枚性灵诗学对诗歌价值的推崇和肯定来说固然也成立，但从翁方纲辈学人诗论将诗冠以"学人"之名来看，更可见时人对诗歌文体价值的信念。尽管学问在当时处于人生价值的顶端，为文士群体所瞩目，但学者仍不肯放弃诗歌，仍希望用诗歌来装饰学问，甚至不惜牺牲传统的"性情"要素，以学问充当诗的动机、诗的素材、诗的内容和诗的目的，以"学人诗"的冠名方式使学问攀附于诗而提升品位。这不是诗道之尊么？这种尝试本有意消弭自严羽以来人们意识中学问与性情的对立与紧张关系，但结果适得其反，学问对性情的过度挤压更加剧了性情的反抗，从袁枚《随园诗话》对以学为诗的抨击来看，性灵诗学与其说是对格调派的反驳，还不如说是对学人诗的警戒，由此形成乾隆诗学的两个主题——性情与学问，两者之间既有对立，又有融合，其相位的变换与矛盾冲突构成了乾隆诗

①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民国十八年退耕堂刊本：自叙.
②吴荣光.石云山人诗集//清代稿钞本：第 28 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33.
③黄景仁.两当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00-340.
④赵翼.瓯北集//赵翼全集：第 5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62.
⑤赵翼.瓯北集//赵翼全集：第 5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181-182.

学的主旋律。

性情与学问的冲突,其实是人类文学活动中的一个普遍问题。英国诗人爱德华·扬格曾说:"天才是巨匠,学问不过是工具;而且是一种即使可贵之至,然而并非时时不可缺少的工具。"①因为天才可遇而不可求,不像学问可习而得,人们常将天才视为内在的、先天的,而将学问视为外在的、后天的,其贵贱高下不言而喻。扬格又说:"我愿意以天才比美德,以学问比财富。正如美德越少的人,越需要财富,天才越低的人越需要学问。"②对大多数中才以下的作者来说,学问往往是他们用来文饰才华贫乏的最好的绮罗粉泽。持扬格这种观念的人是欧洲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者,清代诗人与之相比有着自己的特殊语境,即看似繁荣热闹的乾隆诗坛其实也是个创造力贫弱的诗史时段。前辈学者缪钺曾指出:"有清一代之诗,以量言则如螳肚,而以质言则如蜂腰。盖乾隆之际,天子右文,海内无事,家研声病,人习博依,吟咏之风,遍于朝野。是故诗人如林,诗集充栋,较诸清初及清末,似蔚然称盛矣。然清初作者,如吴梅村之哀时感事,不愧诗史;王渔洋之含情绵邈,树立宗风;清末作者,如郑子尹之横恣踔厉,黄公度之恢宏生创,求诸乾嘉,皆罕其匹。"③乾隆诗坛一方面是个诗派林立、各种主张杂陈的喧哗空间,一方面又是缺乏领袖群从之巨人的平庸时代。诗坛的几派宗师,沈德潜才华平庸,纪晓岚用心不专,翁方纲学过于才,姚鼐文过于诗,高密三李气局不大,赵翼、洪亮吉辈又学掩其诗;袁枚倒是才情过人,争奈德行不称,终究难以号令天下。由今日回顾乾隆诗坛,竟像是一个群龙无首的武林江湖。这样的江湖绝不会平静,虽不见面对面的交锋,却随时都有人试图找到诗家倚天剑、屠龙刀,执坛坫的牛耳。

于是伴随着话语权的争夺而来的,便是乾隆诗学的理论旨趣由多元趋向于集中,具体地说就是由地域文化的多元性产生的多元化观念,逐渐趋向于诗学思想的同一性和理论目的单一化。这是由康熙诗学最终定于一尊的结局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康熙诗学当清初诗家对明代诗学的深刻反思之后,竭力拓宽诗歌史视野,扩充取法的传统资源,力求博采众长,成一代伟观。因此,当王渔洋汲取明代格调派的精髓,参以盛唐空灵轻澹之风,提出以神韵为核心的一种新诗歌美学时,诗坛为之风靡,诗家无不踊跃鼓舞,尊奉为一代正宗。可惜好景不长,到康熙后期,神韵诗学就日渐显露出"清利流为空疏"的迹象④,引起诗坛共同的忧虑,乃至群起而讲求有以救之之道,而王渔洋诗学也就成了天下共逐的秦鹿!⑤

三、乾隆朝诗学的研究路径

由常识即可知道,乾隆诗学是更为丰富更为复杂更多疑难问题的一个诗学史时段。面对这一艰难的课题,我们将如何着手研究和论述呢?首先可能需要放弃以地域为单位来呈现诗学格局的论述模式。乾隆诗学除了年至耄耋的鲁灵光沈德潜外,其他重要的诗学流派及其宗师像袁枚、纪昀、翁方纲、姚鼐、李怀民等人,基本上是同时在诗坛活动的,其间的地域色彩和时序脉络并不那么清楚,以流派为单位来论述乾隆诗学,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结,像韦勒克说的"我们必须集中叙述、分析以及评论各种思想见解,纵然我们将会不断遇到孰先孰后和相互关系这类无从解答的问题,将会陷入浩如烟海的印刷品,将会在取舍的必要性上受到挑战"。面对这种复杂的历史状态,"只有通过一种清醒而又纯粹的处理方法",即"一方面决不涉及环绕我们的有关联的问题,一方面对于大作家和主要的思想加以详尽的探讨"⑥,才能有效地完成一种清晰的历史叙述。我也试图如此处理乾隆时代的诗学课题。根据大致的时间次序,以人物和思潮为中心而不是以问题为中心来展开论述。一些联系或跨越流派与思潮的诗学问题,一些诗坛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可以做一些综合性的论述,庶几有点有面,同时照顾到历时性的诗学

---

①爱德华·扬格.试论独创性作品——致〈查理士·格兰狄逊爵士〉作者书.袁可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89.
②爱德华·扬格.试论独创性作品——致〈查理士·格兰狄逊爵士〉作者书.袁可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90.
③缪钺.黄仲则逝世百五十年纪念//缪钺全集:第 2 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185.
④俞兆晟.渔洋诗话序//丁福保.清诗话: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63.
⑤邬国平《赵执信〈谈龙录〉与康雍乾诗风转移》(《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一文曾谈到这一问题,笔者也有《"神韵"与"性灵"的消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一文专门讨论,可参看。
⑥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 1 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3.

史演进和共时性的诗学史展开两个历史视角。这是我在参考时贤的论著，总结其得失后形成的想法。

综览现有的研究成果，大概分为综合研究和专家研究两类。综合性研究除了几种批评史、诗学史的清代卷，断代研究中的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等外，尚有王济民《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诗学》(巴蜀书社，2007)及一些学位论文、单篇论文①；具体研究除了海内外有关沈德潜、袁枚、赵翼、蒋士铨、纪昀、翁方纲、洪亮吉、李调元、章学诚、高密三李等人的专著外，论文尚有台湾前辈学者张健的《〈西圃诗说〉研究》《牟愿相之诗评研究》②。虽然关于乾隆诗学已积累不少成果，但研究者所面临的困难也正在这里。这些成果不仅不易突破，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近代以来，并未广泛调查文献和细致研究文本而匆忙作出的宏观概括，和对前人结论不加深究的轻易接受，使学界长期以来形成一些定论，左右了我们对乾隆朝诗学格局的总体判断。突出表现在现有关于乾隆诗学的论述，从使用的材料到得出的结论都大同小异，一一浏览这些著作常有问题和结论雷同的印象。

但应该肯定的是，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为我们认识乾隆诗学带来启发。首先是将康熙到乾隆的诗歌史视为清诗形成的关键时期③，并将其间诗坛的变迁归结为诗人社会身份的变化，“从王士禛到袁枚，由台阁重臣一变为中下层官吏，社会身份的改变不过是个现象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由此带来的内在变化，创作主体由悠闲从容的贵族俯视视角一变为对人世的平视”④；其次是重视乾、嘉经学家对于清代文学思想史的意义，认为他们最深地感知了“儒家智识主义”兴起的时代精神，是形成和塑造清代中晚期文学思想面貌的基本力量之一⑤；复次是注意到学者的个性化与文学思想的多元化现象⑥，使以往在“乾嘉学风”的宏大叙事下被遮蔽的学术品格和思想方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重新呈现出来。这无疑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乾隆诗学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品格，理解当时各派诗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此外，有学者指出内在精神与外在文饰相统一的充实之美——渊雅是清代中叶的审美风尚的主流，这取决于彼时士人特有的宽容儒雅的持论气度与综合淹通的艺术眼光⑦。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各派诗学之间对立、冲突与融通、互文并存的现实。当时人们对诗学的追求，多强调单纯和本色的个性化倾向。如惠栋《范湖诗钞序》所说：“余不能诗，侧闻先世之论诗矣，曰诗以成家为贵。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鞶帨，其失也靡；濯锦江波，其中宁无一片是卫文之服，其失也杂。二者皆不能成家。”⑧因此他很欣赏息园取法单纯的道路——“原本三唐，而独自成家者”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乾隆诗学在宗派林立、观念冲突的浪潮汹涌之下，还存在着沟通、融合的暗流。面对康熙后期以来神韵诗风流行一时、诗坛面目雷同的现实，乾隆各派诗学纷纷破除壁垒、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传统，无形中形成一股对立、冲突与沟通、融合并存的态势。

事实上，乾隆一朝本是学术多元、学风开放的时代：经学中汉学和宋学共存，文章中古文与骈文并盛，诗学中也是诸多流派并驾齐驱，冲突中有调和，对峙中有融合，形成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的活泼语境。但不可否认的是，性灵诗学终究是乾隆诗学的主流，它不仅风靡一时，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在传统观、价值观、技法观及批评方法等方面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诗学史的走向。事实上，乾隆诗学观念冲突的核心及所激发的理论问题，无不源于性灵诗学对传统诗学的解构和冲击。它对传统的“诗以道性情”观念

---

①刘靖渊.从台阁诗风的消长看乾嘉之际诗风转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刘靖渊.论乾嘉之际诗人的诗心与诗歌.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刘靖渊.论乾嘉之际的诗歌思想与创造精神.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刘靖渊.论乾嘉之际诗歌创作力量结构及其诗史意义.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吴瑞泉.明清格调诗论研究.台北：东吴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8；李然.乾隆三大家诗学比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②张健.诗话与诗.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③严明.清诗特色形成的关键——论康、乾时期的诗风转变.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④王志民.清诗与传统.济南：齐鲁书社，2008：402.

⑤刘奕.清代中期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

⑥河田悌一.清代学术的一个侧面——朱筠、邵晋涵、洪亮吉及章学诚.东方学，1979，(57).

⑦张灵聪.清前中期的时代与文学.江海学刊，2000，(2).

⑧惠栋.松崖文钞//漆永祥.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2006：329.

⑨惠栋.松崖文钞//漆永祥.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2006：329.

的改造,恰好与翁方纲的学人诗观念相冲突,乃至构成乾隆诗学由性灵与学问的冲突、融合交织成的主旋律。当然,性灵派自身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认同性灵说的一批诗论家在追随袁枚之余,不仅逐渐意识到袁枚自身的毛病,同时也对性灵派拥趸次生的流弊产生警觉,从而理性地与盲目追趋者保持一定的距离。更由于"性灵"本身是个开放的诗学观念,只有终极目标而不预设取法路径,留下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于是在乾隆诗坛就出现一批习惯上被视为性灵派而实际上与袁枚诗学始终处于离合之间的著名诗人,包括赵翼、蒋士铨、洪亮吉、方薰等,稍为后辈的还有张问陶、法式善、吴文溥等,他们都是乾、嘉之际才学出众的文化精英,对文学有着异于流俗的见解,并且勇于站在个人立场拒绝或反抗时尚,因此他们的诗学就构成了乾、嘉之际认同、发挥同时修正性灵论的历史。至于那些格调派、学人诗派以及其他不满于性灵派的论者,更从不同角度给予袁枚的性灵诗论以猛烈的抨击,言辞之激烈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文学论争。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抨击性灵派的同时不知不觉中也吸收了性灵派的某些观念,比如高密诗派的诗学无论出发点还是诗歌趣味都不同于性灵派,但在主"深情"一点上却相一致。李宪乔《凝寒阁诗话》曾说:"陈鸿赞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故古今诗人皆古今情之所结,此所以能深耳。"①他一方面承传格调派的精神,一方面自己"向来作诗多不去安排,止意之所动,直直写出便罢,正如世俗人所谓我自有性情,何苦学古人之说"②,让我们看到当时各家诗学离合之间的一种复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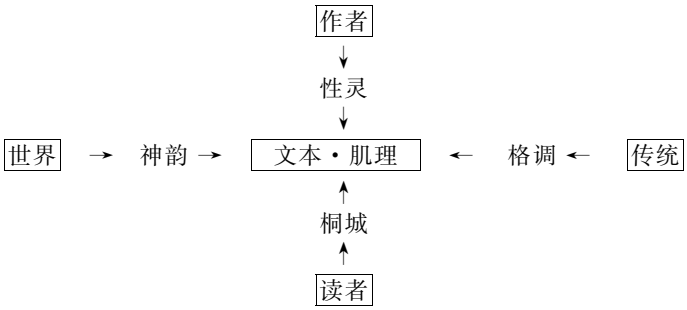
如果从后设的角度看,乾隆朝诗学史的主干确实也可以说就是性灵派萌生、发展并逐渐取代格调派成为诗坛主流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中实际包含的内容却丰富得多,只有袁枚的性灵说,甚至包括赵翼以降一批追随者的诗论作为丹纳所谓"合唱的和声",都不足以展现这一过程的丰富性,只有加入纪昀的试帖诗学、翁方纲的文本诗学乃至章学诚一辈批评者的声音作为第二主题,才构成一部乾隆朝诗学的交响曲。其内部联系的密切和融洽,在古典诗学史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典范:有冲突和对立,但不影响论者的友谊;和而不同,又能保持各自的立场和见解。最典型的是钱载和翁方纲,虽然据当代学者的研究,两人的友谊最后未得善终③,但看姚元之《竹叶亭杂记》所载:"因忆翁覃溪、钱萼石两先生交最密,每相遇必话杜诗,每话必不合,甚至继而相搏。"④以及梁章钜《题苏斋师与吴香亭先生手札卷后》诗自注:"卷中有诋诮钱萼石先生之语,而余在苏斋谈诗时,则熟闻吾师推服萼翁甚至,与此札正堪互证。"⑤亦足见当时诗论家的商榷、论辩风气之一斑。

虽然乾隆诗坛的各个流派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时间顺序,也不一定存在清晰的代兴和并生关系,其发生和发展自有其内部的原因,但最后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在不同流派对立、冲突、交流的刺激下,逐渐形成不同的自我定位及相关意识,并由此与诗学史的内在逻辑相关联,则是可以确定的。文学史的经验表明,文学观念的变化、消长不外乎革陈求新、惩弊趋正、扶衰返盛三种类型。王渔洋诗学原有兼综包容的倾向,且有格调诗学的底色,只不过神韵侧重于审美效果的追求,遂演变成一种印象主义的诗学⑥。它对传统、对才性、对言情体物的全盘主张虽出于中正远大的美学追求,但终究陈义太高,常人很难把握,盲目学之,往往买椟还珠,流于空虚肤廓,从而引发雍、乾之际诗家对其流弊的反思和救治。事实上,被命名为格调、性灵、肌理的三派诗论无不以救神韵论之弊为出发点:神韵诗学之失,在沈德潜看来是风格的单一化,故救之以兼综古今的多元风格,此谓革陈求新;在袁枚看来是无真性情,故救之以性灵的自由抒发,此谓惩弊趋正;在翁方纲看来是流于空腔肤廓,故救之以肌理切实之旨,此谓扶衰返盛。这三种诗学的对峙和交融,就迎来古典诗学一个全面的总结期。

如果按今天我们对文学理论的理解画出一个图式,那么神韵、格调、性灵、肌理分别占据了相应的位置如下:

---

①李宪乔.凝寒阁诗话//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 47 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255.
②李宪乔.凝寒阁诗话//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 47 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263.
③程日同.钱载与翁方纲后期关系考论.文学遗产,2016,(5).
④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125.
⑤梁章钜.退庵诗存//续修四库全书:第 1499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62.
⑥关于王渔洋诗学印象主义倾向的讨论,可参看蒋寅.王渔洋"神韵"的审美内涵及艺术精神.中国社会科学,2012,(3).



王渔洋的神韵诗学是一种印象主义诗学，侧重于审美效果的追求，所处理的是诗与客观对象的关系；沈德潜的格调诗学是一种规范的诗学，所处理的是作家写作与诗歌传统的关系，这是唐宋以后所有诗人都无法回避的首要诗学问题；翁方纲的肌理诗学是一种关于文本组织的诗学，所处理的是具体作品的表意与文法的问题，这是诗歌写作中最形而下最直接面对的问题。在上面这个理论谱系中，读者一端在乾隆间其实还空缺——这是古典文学理论的共同缺陷，在中国要到桐城派后劲方东树论述学诗法，才有所弥补。经由常州词派的阅读理论，发展到近代《选》学名家李审言《杜诗证〈选〉》《韩诗证〈选〉》，从而开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研究古代作品影响的先河。因此不妨说，乾隆间流行的这几家诗学已共同构成了古典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从这个角度来看各家的理论品格就很容易把握其独到贡献。

但这里还有一个较复杂的问题，就是无论在前人的论说还是在今人的划分中，对哪些论者属于哪一派，都常有不同的看法。各派内部往往也有异同之辨，如郭麐《灵芬馆诗话》卷八论乾隆三大家云：

> 国朝之诗，自乾隆三十年以来，风会一变，于时所推为渠帅者凡三家，其间利病可得而言：随园树骨高华，赋材雄赡，四时在其笔端，百家供其渔猎，而绝足奔放，往往不免。正如钟磬高悬，琴瑟迭奏，极其和雅，可以感动天人，协平志气。然鱼龙曼衍，黎靬眩人之戏亦杂出其间，恐难登于夔、旷之侧。忠雅托足甚高，立言必雅，造次忠孝，赞颂风烈，而体骨应图，神采或乏。辟如丰容盛鬋，副笄六珈，重帘复帐，望若天人，欲其腾光曼睩，一顾倾城，亦不可得。瓯北禀有万夫，目短一世，合铜铁为金银，化神奇于臭腐，力欲度越前人，震骇凡俗。辟如阿修罗具大神通，举足搅海，引手摘月，能令诸天宫阙悉时震动，但恐瞿昙氏出世作师子吼耳。要皆各有心胸，各有诣力，善学者去其皮毛，而取其神髓可矣。①

这里指出的性灵派三大家的差异，有时会与其他派别的人物相交叉，在这种情况下，对各派阵营的划分，或具体某些人物的归属，便会出现不同的判断。对此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参照系：由取法的角度看，对杜甫、韩愈和黄庭坚的态度可以成为乾隆时代区划流派的一个依据。即根据是否宗杜，首先可将沈德潜、翁方纲、姚鼐与袁枚、高密三李划分开来；再根据是否学韩，又可将沈与翁、姚，袁与高密三李区分开来；最后根据是否学黄，从而将沈、袁、高密三李与翁、姚区分开来。如果看不到其间的差别，就很难理解各派诗论的旨趣所在。比如，翁方纲很推崇韩愈，应该与同样崇韩的高密派见解融洽，但事实如何呢？且看翁方纲《刘松岚诗序》的说法：

> 三十年前，予于方坳堂斋壁见李少鹤兄弟诗而异之。其后得交松岚，始见所为《二客吟》者，又见石桐重订《主客图》。及松岚官沈阳，又为黄仲则刊诗集于京师。然其所自为诗，天机清妙，寄托深远，初不限李氏兄弟之说。即于申、辕故里，亦不主沧溟之格调，抑且不专执渔洋之三昧也。予于松岚往复商略此事，迨今又将廿年矣。而其气骨日益高，取法亦日益上。往者李沧云视学盛京，予与别语，惟勗以与松岚研求作者之意。而去年李春湖为刻石桐《续主客诗》二卷，予亦为辨析学唐音必求杜法之所以然，又深以未得与松岚面质为感。②

①郭麐.灵芬馆诗话.嘉庆十二年家刊灵芬馆全集本.
②翁方纲.复初斋集外文：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36.按：文作于嘉庆十五年(1810)。

这里出于尊题的需要,没有像在其他作品中那样明显表达对高密李氏的非议,但最后仍然曲折地流露出对三李昆季不学杜的不满。从上文的辨析看,翁方纲与姚鼐的诗学趋向最为接近,其中蕴含着清代中叶迄晚近诗学以杜甫、韩愈、黄庭坚为骨干的诗学主潮的苗头。格调、性灵两派在嘉道之后渐趋消歇,而以学杜、韩、黄为主流的学人诗风却日渐高涨,最终发展为盛行一时的"同光体"。可见翁方纲和姚鼐两位的诗学对清代后期诗歌史的参与明显是更深的,诗学史的意义也更为重要。而相比翁方纲来,姚鼐又更为以往的研究所忽略,这就使近代诗歌的历史认知缺少了重要的一环。

按理说,无论是从诗学的理论水平还是从经验价值来看,沈德潜吸收神韵论而形成的新格调说和袁枚综合前代多种观念建构起来的性灵诗说,都是乾隆朝诗学中贡献最大、成就最高的学说,但正因为它们在嘉、道以后丧失了主流地位,后人的评价都大打折扣。

当今文学研究中盛行的文化研究,更经常只是将一个时期的文学或理论趋向与特定文化、思想背景相联系,给予一种学理性诠释,而不太愿意去深入研究其中的技术内容和理论细节。这样一种研究看似纵横捭阖,视野开阔,其实很空泛很表面。尤其是在清代诗学研究中,很容易导致历史视野的狭窄和关注问题的雷同。为此,我在研究中不仅要关注各派诗学的外部交流和内在关联,留意其间的时序和影响关系,还要特别注意这个时代诗学的公共话题、普遍性问题及其与学术文化、创作实践的多元关系,揭示其诗学理论的现实指向性、批评史意义上的当代性以及学术史意义上的总结性。由此建构的乾隆诗学是一个比《清代诗学史》第一卷呈现更丰富的观念多样性和更具有学术史含量的历史过程。尽管它的时间跨度比第一卷要短三分之一,但涉及的内容却只会更多。"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子这两句诗仍然是鞭策我不倦努力的座右铭。

Issues and Methods in the Research of Poetic History in Qianlong Period

JIANG Yi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Qianlong wa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periods of culture and learning in Qing Dynasty. It was also the most developed period of poetry. There were many poetry theorists and poetic schools. Affluent society, the monarch, imperial restoration on poetry, imperial examination resumed Poetry, the shogunate struggle for talent, causing widespread poetic atmosphere. The strong academic atmosphere, while giving poetry a strong stimulus, also squeezed the space of poetic life, bringing the tension of temperament and knowledge. The original style of poetry to summarize and synthesize, promotion of the private school poetry Renaissance by *Shitie*(试帖) Poetics, the Poetics of natural disposition and texture poetics from different directions to remedy the defects of verve poetry and pioneer the new way, the *Tongcheng*(桐城) School, *Gaomi*(高密) Poetic School from different literary traditions developed their own poetics, strengthen the Poetics of Qianlong the overall pattern of diversified and rich poetic theory, the research of Qianlong's poetic history faces hitherto unknown complexity. Based on the summary and reflection on the finding,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ir research approach of taking temporal clues as longitude and taking the schools as latitude to exhibit a clear and reasonable pattern of Qianlong period poetics discussion.

Key words: Qianlong Period; poetic history; Qing Dynasty; shogunate

●**收稿日期**:2017-07-08

●**作者地址**:蒋 寅,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2BZW051)

●**责任编辑**:何坤翁